

02-1

类号	Г
序号	705

48
3-1

Nº 04386

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的 党内閱讀文件(之一)

(党内文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軍事学院編印

一九五八年二月

目 录

(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

一、必讀文件

-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圍剿”的总结決議（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1

二、参考文件

傅鍾 論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学說

——摘自政治工作基本問題講稿（初稿）……………15

第二次“左”傾路綫的錯誤主張

——摘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立三路綫，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決議）……………41

第三次“左”傾路綫的錯誤主張

（一）摘自“由于工农紅軍冲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机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44

（二）摘自“中共五中全会政治決議案”（1934年1月18日通过）……………45

(二) 論持久战

一、必讀文件

- 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則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給彭德怀同志）……………48

二、参考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決議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決議，

2F96/14

第一、二、三、五节)	48
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6日，第一、二节）	55
陈毅：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1942年7月，华中抗战史料，上册）	59
陈毅：论军事建设（华中抗战史料，上册）摘录	66
一、论华中情况及其战略动向	
（一）敌军情况；（四）战略动向；（六）斗争的形势和我们下决心的基础	
二、实战的经验教训	
第一、敌后工作与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第四、对敌伪配合作战的对策	
第五、反扫荡中的部队配合与地区配合问题	
第六、民兵战术问题	
抗战三年敌我战略战术之演变	78
敌军一、敌军在各时期的战略战役企图	
三、敌军各时期战术演变之原因及其规律	
我军一、总的战略任务	
二、三年来战略方针及战略指导上之演变	
三、三年来战役方针及战役指导上之演变	

（三）十大军事原则

一、必读文件

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总结与第二年战略方针指示（1947年9月1日，战史资料第二辑）	92
彭德怀：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1948年1月11日，战史资料第二辑）	95

二、参考文件

中央军委关于全党全军动员起来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	
-------------------------------	--

(1945年12月5日，战史資料第二輯)	97
中央关于三个月(7、8、9)时局的总结与指示(1946年 9月30日，战史資料第二輯)	99
中央軍委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軍事計劃(1948年，战略方 針，作战計劃，战史資料第二輯)	100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決議(1949年3月13日第一、二 条)	103
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 (1948年1月11日，战史資料第三輯)	104

(一)

中共中央关于 反对敌人五次“圍剿”的总结决議

(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圍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补充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圍剿”的决議中，曾经清楚地指出五次“圍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圍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1933年7月20日中央决議)。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圍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圍剿”的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它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圍剿”

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变化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这方面，主要的以运动战箝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是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2月

来电說得很对：“我們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軍事指揮所采用的計劃和步驟，差不多可以說常常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們挑撥，使我們常常不必要的改組我們的力量。因此我們的力量由于繼續不斷的变动，就不能积极的参加作战。我們觉得應該在那些我們已經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綫上同时击败敌人”。單純防御路綫的領導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2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紅軍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單純防御路綫，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綫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綫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綫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則变为全綫抵御，而在战略上則二者都是錯誤的。

“不放棄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軍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則是完全錯誤，而适足成为單純防御路綫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絕對占优势，他們常常拿多于我們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們进攻。然而这对于我們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綫，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們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們在战略的內綫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綫作战（局部的外綫）的利益，即是以我軍的一部箝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圍剿”。在战略的內綫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綫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紅軍經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則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計劃。

但是过去單純防御路綫的領導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于敌人對我們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許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們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偉大的胜利。單純防御路綫的領導者給紅軍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爭取主动权，不是爭取决战的胜利。其結果就是

紅軍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紅軍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圍剿”开始时(前年10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們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陣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2月来电又重复的說：“很显明的，根据过去的經驗，我們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經获得了許多偉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強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圍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們虽沒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驅直入”时采取大規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經多次的証明了(洵口、团村、將軍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軍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綫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論，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轉变到陣地战，而这种陣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現時工农紅軍是极端不利的。

強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絕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調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許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輕易的強攻堡垒，其沒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着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計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圍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圍剿”絕然的分开，因而絕然否認过去运动战的經驗，絕然否認誘敌进来給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絕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領導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計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計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論，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轉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給林彪、彭德怀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許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見××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紅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禦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論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們不能否認：堡壘主義造成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新的困難（而他們最初却以左的空談輕視堡壘主義，見××同志紅星報文章），不否認而且應準備紅軍的技術條件（飛機大炮），特別是堡壘內的工農士兵暴動，以戰勝將來敵人更堅固的堡壘。但就在現時條件下，堡壘主義也是能夠粉碎的。堡壘主義疲勞了敵人的兵力並分散了兵力，養成了敵人對於堡壘的依賴性，使他們脫離了堡壘即失去其勝利的信心，同時敵人無法不脫離堡壘向我們前進，又無法在全國範圍內遍築足以限制紅軍行動的堡壘。一切這些，造成了使我們能克服堡壘主義的順利條件。因此我們紅軍粉碎堡壘主義的方法，依然是依靠於運動戰，依靠在堡壘綫前後左右發展游擊戰爭以配合紅軍的行動，以及依靠深入的白軍士兵運動。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在堡壘綫內即是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綫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只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而且只有正確的戰略戰術方針，才能正確的領導戰役，並正確的運用戰術，以粉碎堡壘主義與粉碎“圍剿”。單純防禦與“短促突擊”，勝利主要不依靠於戰略戰役的正確領導，而僅僅依靠於戰術，實際上只是對於堡壘主義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壘主義。

（九）在持久戰與速決戰問題上，單純防禦路綫的領導者的了解也是錯誤的。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蘇維埃革命，就在不斷的粉碎敵人的“圍剿”中發展與鞏固起來的。因此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我們完全應該從防禦轉入反攻與進攻，消滅敵人，粉碎“圍剿”（如一二三四次戰爭及五次戰爭廣昌戰役以前）。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暫時的退却，以保持我們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條件下轉入反攻與進攻（如五次戰爭廣昌戰役以後），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但同時必須了解另一個原則，即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於每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的速決。因為在現時，敵我力量的對比上，對於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採取持久戰的方針，對於我們是極端不利的。當着敵人以持久戰來對付我們的時候（如五次“圍

剿”），我們必須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針，打破敌人这种計劃，在我們可能支持的時間之內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圍剿”。拿我們的人力物力及軍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較（即所謂同敌人拚消耗，見××同志紅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錯誤的。在这些方面現時我們正处在絕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較只能証明相反的結論，即持久战對我們是沒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國內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个“圍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們特別要謹慎的决定我們的战略战役計劃。五次战争中單純防御战略是根本錯誤的，在这种錯誤战略之下，进行許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三、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錯誤的，紅軍一定要避免那种沒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們时，我們立即应拒絕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們一定要給予紅軍以必須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訓練的時間，这是爭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沒有休息訓練的可能的說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單純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結論。以为紅軍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經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訓練，也是不对的，須知沒有必要的休息和訓練，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紅軍的編制，一定要适合現時國內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許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應該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訓練又无战斗經驗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應該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們在老的兵团指揮之下，訓練出战斗經驗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輕的組織与装备是不对的，應該是尽可能的輕装，必須充实連队与加強师以下的領導。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須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論。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紅軍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階級武装的特質，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換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

义的战斗，須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沒有坚强的紅軍，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紅軍，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損失，也終究能夠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紅軍才能創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圍剿”被我們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錯誤倾向：一种是对疲劳情緒与过高估計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們懈怠消极，使我們停頓不动，使我們不能由反攻轉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紅軍力量，使我們不能在敌人新的“圍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圍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計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計不足所产生的冒險主义。这种冒險主义使我們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致于使反攻中已經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棄，使紅軍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紅軍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棄不顧，这同样使我們不能在敌人新的“圍剿”到来之前取得繼續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錯誤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問題上即在敌人两个“圍剿”之間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緒的仓卒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認為沒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圍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內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圍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們的内部的裂痕，使我們利于轉入反攻与进攻，是我們粉碎敌人“圍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軍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圍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綫，同十九路軍訂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軍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談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針，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軍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軍事变是粉碎五次“圍剿”的重要关键之一。

相反的以为紅軍繼續在东綫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的側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軍，因此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軍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軍事上突击蔣介石的側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軍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圍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隊，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別，这个派別企图用更多的欺騙与武断宣傳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詞来維持整个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我們在实际行动中表現給在十九路軍欺騙下的工农士兵羣众看，我們帮助任何派別反日反蔣的斗争，我們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軍軍閥的欺騙，在共同反日反蔣的战争中，爭取他們到我們方面来。只有我們軍事上采取与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才能使我們在当时这一重要關鍵上不失去消灭蔣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沒有的。然而在我們軍事上沒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綫的領導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們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轉入反攻与进攻，在他們看来是冒險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轉变与实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样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首先應該說的：當我們看到在中央苏区繼續在內綫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經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沒有可能时（1934年5月至7月間即广昌战役以后），我們应毫不迟疑的轉变我們的战略方針，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們的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6月25日来电曾經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們惊惶失措。甚至說到对苏区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討論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議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紅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們的战略方針显然也是錯誤的。“在5、

6、7 三个月战略計劃”上，根本沒有提出這一問題。在“8、9、10 三个月战略計劃”上虽是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計劃的基本原則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針相反，“用一切力量繼續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補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計劃基本原則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問題，完全忽視。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針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錯誤，再加上陣地战的发揚，給了紅軍以很大的損害。这种一方面預备突圍，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單純防御路綫的領導者到了轉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突圍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轉变不但沒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紅色指战員中进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把数百万人的羣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認為不是重要的問題。在主力紅軍方面，从苏区轉移到白区去，从陣地戰場轉移到运动戰場去，不給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頓訓練，而只是仓卒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法問題，始終秘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錯誤。龐大的軍委縱队及各軍团后方部的組織，使行軍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緩，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的忘記了紅軍的战略轉变將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記了紅軍在长途运动中，將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許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特別战略方針不放在爭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則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經常处于被动地位，經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圍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沒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經常說“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經常是“避战”。就使得紅軍士气不能发揚，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

因而減員到空前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爭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紅軍战略轉变，迫使敌人轉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計劃，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圍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紅軍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針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結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錯誤观点出发，即是說紅軍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則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縱队），就在他們分离时与疲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錯誤观点的来源，則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許我們这样简单地輕巧地徑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計。殊不知这种簡單的輕巧的与徑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圍剿”环境中的主力紅軍的巨大战略轉移則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与敌人的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則是不應該避免的。此次突圍行动，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发展到突圍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紅軍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軍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經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針。紅軍到了烏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轉入反攻消灭蔣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見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謂土匪的任务。虽則最后两次錯誤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糾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則适足表現其战略上一貫的机会主义的傾向。

单纯防御路綫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別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會議認為一切事实証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綫，是我們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綫来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綫作辯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會議認為这种軍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綫，是一种具体的右傾

机会主义的表現。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計，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紅軍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會議認為反对軍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綫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轉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糾紛的企图，必須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會議認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极端的恶劣，軍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軍委的集体領導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对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揮員的机断专行与創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轉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許多宝贵經驗与教訓完全拋棄，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軍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見，而且曾經发生过許多剧烈的爭論，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軍委内部极不經常的現象。

同时政治局更認為过去書記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軍委領導是非常不夠。書記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紅軍与保障紅軍的物質供給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偉大的成績，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則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責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們沒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揮問題，关系于战争勝負的全局。战争指揮的錯誤，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績化为烏有。政治局对于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自己應該承認的。書記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應該負更多的責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計劃是經過書記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會議特別提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揮上所犯的路綫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内部不經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时的去糾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錯誤的发展。政治局扩大會議認為××同志在这方面應負主要的

責任，而××同志在他的結論中對於絕大多數同志的批評與自己的錯誤是沒有承認的。必須指出，這種錯誤對於××同志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這一錯誤如果堅持下去，發展下去，則必然走到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

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為了粉碎敵人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

(十四)最後，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雖是由于我們過去軍事上的錯誤領導使我們沒有能夠在中央蘇區內粉碎五次“圍剿”，使我們主力紅軍不能不退出蘇區並遭受到部分的損失，然而我們英勇的紅軍主力依然存在着，我們有着優良的羣眾條件，我們有着黨的正確領導，我們有着物質上地形上的比較良好的地方，我們有着全國廣大的羣眾擁護，與紅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勝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確的作戰指揮，我們相信，這些困難，在我們全體同志與紅色指戰員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時，敵人方面的困難是大大地增加了，我們活動地區遠遠地離開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據地，蔣介石幾年經營的堡壘地帶的依靠是沒有了，軍閥內部的矛盾與不統一有了進一步的增加，我們主要的敵人蔣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圍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全國國民經濟的空前崩潰，使全國民眾更清楚地看到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而更加同情與擁護蘇維埃革命運動以至直接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這些都是我們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發揚全國蘇維埃運動的有利條件。必須指出，目前的環境在黨與紅軍面前提出了嚴重任務：這就是因為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國民黨軍閥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放鬆我們。我們在敵人新的圍攻的前面，中央紅軍現在是在雲南貴州地區，這裡沒有現存的蘇區而要我們重新去創造，我們的勝利要在自己艱苦奮鬥中取得，新蘇區的創造，不是不經過血戰可以成功的。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樣戰勝川、滇、黔、蔣這些敵人的軍隊。為了戰勝這些敵人，紅軍的行動，須有高度的機動性，革命戰爭的基本原則是確定了，完成作戰任務則必須靈活的使用這些原則。紅軍運動戰的特長，在五次戰鬥中是被長期的陣地戰相當的減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紅軍各級指揮員具有高度的運動戰戰術。因此從陣地戰戰術（短